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
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学生论文

经济学学习作

(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策划

经 济 学 习 作

(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编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2003 年 北京

责任编辑：赵兰芳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经济学习作

(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13.5 印张 330000 字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3813-X/F·3116 定价：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习作. 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11
ISBN 7-5058-3813-X

I. 经… II. 中…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616 号

前 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是教育部首批确定的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基地的目标是培养品学兼优、基础扎实、知识面广、适应性强、具有创新意识的面向 21 世纪的高水平经济学基础人才。自 1998 年基地成立以来，基地以教育部提出的“目标明确、改革领先、成果突出、师资优化、设备先进、教学优秀、质量一流”的要求为指导，在人才培养的内容、方法、层次、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推动了基地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与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经济学习作》，收集了基地班学生创作的比较优秀的论文，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地工作的成果。这些论文虽然还比较稚嫩，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相信，经过努力，稚嫩的幼苗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编者

2003 年 10 月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

学术委员会名单

基 地 主 任：杨瑞龙

基 地 副 主 任：高德步 张 宇 刘凤良

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于同申 方福前 刘凤良

吴汉洪 陈享光 陈勇勤

张 宇 杨瑞龙 郑超愚

高德步 姚开健 韩小明

雷 达

基地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周业安 李军林

目 录

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思考	王 迅 (1)
绿色壁垒下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创新	
——山东龙大集团个案分析	王胜民 (12)
苏南模式的嬗变	张 展 (31)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一个特殊现象的分析	
——对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在新情况下的应用	孙 锐 (45)
对地方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分析	
——从地方保护主义看地方政府的行为	赵晓男 (62)
分层经济及主导消费品供求	刘 霄 (79)
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进程理论：一个分析框架	
——兼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异同和整合	古元峰 (93)
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综述	张 斌 (107)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赵晓男 (123)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构建失灵及其解决的模式	
——义乌小商品市场变迁的案例研究	杨丽青 (149)

“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思考

——从电网改造探讨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相容 杨继东 (169)

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研究

——以华联超市借壳上市为例分析 韩 梅 (181)

企业中的创新与信用 刘 霄 (205)

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另一种解释

——依循马克思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理论的逻辑 洪福海 (214)

网络的定价功能和中小企业融资 江 艇 (226)

近代新式棉纺织企业工头制管理方式浅析 李雅菁 (248)

我国房地产行业特征与现状分析 李德友 (266)

中国邮政改革研究 刘维亮 (296)

“进场费”问题研究

——对超市收费现象的分析和预测 杨 虹 (318)

关系贷款合同 黄纯纯 (332)

在中央银行业与自由银行业之间 徐丽芳 (361)

烫手的山芋, 谁来接?

——对 2003 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经济思考 李海龙 (381)

大学生家教“高价低质”现象的

经济学分析 穆 倩、张振翼、解 莹 (405)

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思考

王迅（经济学专业 2001 级）

一、导言：问题的提出

怎么样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在传统农业方式还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的中国很多地区，如何完成这种转变就成了解决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首先，传统农业可以被定义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舒尔茨，1964）。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包括“技术状况长期内大致保持不变”和“人们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和改进技术的动力”。也就是说，在传统农业中，人们没有对新要素的需求，对于传统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始终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在本文

中，作者将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阻碍和消除这种阻碍的方法三个角度出发，对在近现代农业发展史中工业要素向农业引入的机制和过程作一个模型的描述，并对某些经济社会无法改变传统的农业均衡模式的原因提出作者的解释。

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农业的革命

农业的革命是第二次经济革命的一个部分。首先，“经济革命”一词被认为“试图表达经济体制中两种不同的变化：作为知识存量的变化结果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同样重要的实现这种生产潜力的组织变化”（诺斯，1990）。第二次经济革命是通过机器的发明、新能源的产生和新物质的运用，使工业替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这次革命在农业中的表现：一方面是工业产品和工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的运用；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工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模式代替了传统企业的组织结构，即农业在制度上的工业化过程。此次转变不仅在简单的物质层面满足了飞速增长的人口，特别是非农业人口的需要，而且在制度上将农业人口纳入到现代农业的框架中，使得无论是技术的创造和引进还是对过剩人口或劳动力的安排都与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经济运行模式相一致。

对于这种转变发生的原因，我这里将借用诺思关于第一次经济革命——即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转变的劳动边际产品价值模型，对农业革命的进程，即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后的农业过渡的过程进行描述和讨论。

我首先解释图1中传统农业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土地，具有一定生产经验的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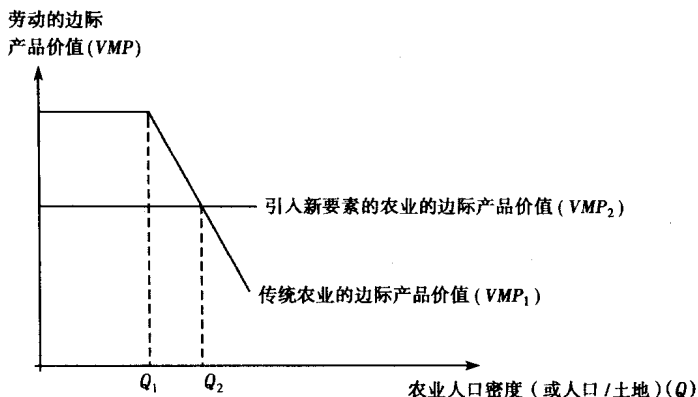


图1 劳动边际产品价值比较模型

力，简单的劳动工具和自然气候条件的参与来进行的。在人口相对稳定增加的社会^①，或者说是人口对土地压力较小的社会，人口（或农业劳动）的增长可以通过开垦新的土地或依靠世代积累的劳作经验，或者缓慢地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来保证农业生产以一种稳定的比例增长——即维持农业的边际产品价值保持不变（如图1中 Q_1 以前的 VMP_1 曲线）。然而，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土地基本开垦殆尽，或新开垦的土地无法再保证维持一个与人口相适应的增长率时，劳动力的增加必然使得劳动的边际收益呈下降趋势。或者说在土地相对于人口或劳动迅速增长呈相对稳定状态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 VMP_1 曲线）将向下弯曲。正如中国清末民国初期（如表1所示，农业人口中每人所占改良后土地的面积明显的呈现下降趋势）和英美工业前期所显示

① 当然这种稳定也是分为两个方面的：一是自然的稳定——即人类社会早期生存环境恶劣所造成的自然死亡率所带来的人口增长的稳定；也包括人为的稳定——即通过人们对资源的竞争，如战争、屠杀等，以及在一些地区存在的通过禁忌、杀死婴儿来抑制人口膨胀的行为。

的那样，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再能维持一个不变的边际产品价值。这时，能避免马尔萨斯可怕预言的惟一方法就是在农业中引入新的要素。这种要素依靠工业社会的制度运行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技术的需求和鼓励人们对技术的创造，同时依靠技术替代对土地数量增加的依赖，而转向成倍地提高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从而使一个不变 VMP 曲线（如图 1 中 VMP_2 曲线所示），乃至向上倾斜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在一个人口密度极速增长而土地即将开垦殆尽的社会成为可能。美国的农业革命，在使用机器方面，是出现于 1860 年以后的那半个世纪，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农业生产增长了 4~5 倍。^①

表 1 人口密度

年份	1880	1900	1910	1920	1930
农村人口（万人）	32950	39313	41637	42437	44637
人口总数中每一人口所占改良后土地的面积（亩）	5.7	5.5	5.2	4.8	4.3

资料来源：《1932 年商务年鉴》卷 1，第 132~133 页。

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无论这种引入新要素的初次探索性选择是人们有意识的行为还是偶然的巧合，它的展开和大规模地运用则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比较静态均衡模型来完成的。比较静态模型改变了地区内部原有的收益成本曲线，打破了传统的利益均衡。在一个开放的、信息能够充分交流的、竞争能够充分展开的区域、地区与地区之间能通过最基本的比较和选择过程完成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地区与地区之间或者因为适应而胜出，或者因为抵制而淘汰。总之，均衡的结果是引入新要素的农业或是工业化了的农业代替了传统农业成为基本的农业生产方式。西欧和美国

① 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的农业革命很好地验证了这一模型。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方国家,同样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为什么农业没有像图 1 所显示的那样向 VMP_2 方向转折,反而在 Q_2 之后继续沿着 VMP_1 曲线运动呢?如果说西方的工业革命和这些经济社会在知识结构上的准备至少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的话,在比较静态均衡模型的形成过程中因为制度上的原因没有改变地区内部旧的均衡模式,即收益成本曲线的移动没有向着形成或引入预期的要素方向进行,或者外在的力量根本没有改变人们的收益预期,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列出建立比较静态模型以及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条件。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从这几个条件出发对中国及一些传统农业社会和西方的农业走向不同的道路的原因作一个具体的探讨。

条件:(1) 农业中建立较为明晰的排他性产权。即农民对这种新的要素的引入有足够大且相对稳定的预期收益,而使激励机制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

(2)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能充分进行,人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形式(包括普通的信息传达和竞争、战争或其他野蛮的方式)提供一种信息的刺激。

(3) 较低的交易成本和执行成本。即改变原有的制度的摩擦成本不大或可以得到良好的解决,使得前者的学习成本加上这里所说的摩擦成本之和不至于大于人们对于新要素投入的预期收益。

三、比较分析和中国的问题

(一) 排他性的产权

产权可以定义为个人和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它们使所

所有者能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在这些资产的运用中所产生的收益（柯武刚、史曼飞，2000）。建立明晰的稳定的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力，可以稳定人们对收益（或损失）的预期，减少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激励了人们的投资积极性，即单个农民对于将新要素引入农业耕作中所得的收入有了稳定的预期，而预期收益较之这种传统的收入分配模式足以弥补引入新要素所可能带来的技术上或文化上的损失。资本主义式的产权形式在农业革命的初期表现为一种斯密所说的永久性的固定租金制度。斯密认为，佃农制度代替农奴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在产权安排上防止了奴隶的那种“喜欢吃得越多越好，工作则越少越好的”态度。但是，这种佃农制度并不完善，因为它实际上将收益的一部分按比例地被地主抽走。而后来逐渐取代佃农的固定租金制度，但有限或不确定的租期造成了农民对土地的竭力的开垦和滥用，并限制了投资于土地的积极性。只有这种终身租用制（包括家族的终身）在英国首先创立后，刺激农业大规模变革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真正建立起来。而在清末的中国，农村中存在着“永佃制”，农业基本以佃农制（包括佃仆制和无人身依附的租佃制）为主。但农民要取得永佃权，除按时交租外，还得先付出一笔远远超过地租数量的巨额押租。如民国时出版的《云阳县志》卷13所记载的，四川云阳“压屠之费，常逾千两或百两”。即使这种家佃权代替了原先的佃仆制，减少了农业的不确定性，但地主参与分成仍然降低了租地农民对于投资的产出预期。同时，这种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却限制了人口的流动，使得下面提到的影响农业革命发生的“信息成本”扩大了。

清代对私有产权的限制还体现在对土地转移限制条件很多。自由转让权也是私有产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地主卖田先卖“四面”权（即土地使用权），分多次卖，且保有“加找”权，再卖

“田底”权（即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很曲折。这使得土地无法集中在有能力或有积极性引入新要素的地主手中。而在19世纪的英国，“由于授产决定的放款和家庭的一般衰落和绝嗣，土地比较自由地投入市场”（克拉潘，1964）。土地资源从而得以在市场上得到最优的配置，即土地可以自由地转移到拥有资本优势（从而保障技术变革的可能性）的所有者手中。

由于在土地产权上的不明晰，无论租用土地的农民还是收取固定租金的地主都没有对引入新要素产生足够大的收益预期。同时，也没有人对无效率的生产模式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上的损失和潜在的竞争压力负有责任。而只有当明确的排他性产权在农业中建立起来之后，收益和成本才能完全“内部化”，土地所有者或租用者才有可能对新要素的引入所潜在的收益成本作出估价，也有可能产生引入这种要素的内在动力。

（二）信息成本

信息成本是指人们之间互相进行信息沟通和传递所需要的成本，它是建立比较静态均衡模型或者说建立普遍化的现代农业的成本之一。地区和地区之间常常通过交流或通过强制的文化输入对人们进行信息上的刺激，这里的信息既包括知识层面的新要素的运行模式，如新的技术和工具，也包括改变人们成本收益曲线的新的思维方式的传播。信息成本的降低得益于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流动一方面取决于地理因素，即地区与地区之间无法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完全封闭或隔离；另一方面是社会习惯意义上的，在中国即表现为农村家庭或政治和后来的永佃制度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束缚，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农民在思想上的宗族式观念。

据《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载，除了饥荒、战争或强制性驱逐等因素外，农村的人口很少迁徙，“很多家族常常无

一人外迁”。而即使在外迁人口较多的家族，外迁人数也往往只占家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也使得技术和对新制度的尝试停留在狭小的区域内，清代各地，乃至在自然条件和人口数基本一致的一个省区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也非常大：在江浙一带，有单位面积产量亩收 6~7 石的高产区，而在浙江平湖地区亩产仅 1 石；在中国南方亩产约 2 石左右，北方则仅以斗计。新的要素在一些地区由于很偶然的因素被吸收到农业生产，从而停止了农业边际产品价值下降的趋势后，临近的地区却仍可以泰然地使用原始的耕作方法而不至于因竞争或比较而造成的在机会成本上的损失。

如果暂且不论由地理因素（如南方多山，沟通存在地理上的障碍）所造成的自然隔离，经济制度上的永佃制和政治制度上的宗族制是带来巨大信息成本的两大重要原因。“永佃制把佃农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取得了永佃权后，往往世代耕种，很少有弃耕、逃亡等现象”（吴昱恺，1991）。而宗法政治和与此相关的家族观念在底层社会中的根深蒂固，使得人与家族的命运、与家乡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使得无论是对人口的流出或流入都在习俗与文化上造成了有形或无形的障碍。中国传统的“村落社会中不同的分家和本家以及宗支关系，已使村落社会的组成渗透着强烈的血缘色彩”（麻国庆，1999）。从财产继承到家庭分工到纲理伦常，中国的农村人口完全被束缚住了。在一个人口世代固定的地区，信息输入总是相对有较大障碍的，而正是这种障碍或成本，使得比较静态模型无法达到预期的均衡点。

（三）交易成本或执行成本

交易成本首先考虑利益主体间的摩擦成本。引入一种新的制度模式，或者说重新安排产权结构，除了上面说的信息、吸收和学习上的“技术成本”外，还会造成利益重新分配导致的摩擦成

本，即利益丧失者或相对利益丧失者（即增加的比例远远小于得益者的利益增加比例）的阻力所造成的成本。而在农村的这次制度变革中，利益丧失者不仅包括享受垄断权力的地主，也包括大量失去土地而成为农业工人的自耕农（中国的自耕农数量是很可观的，约占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在美国经济史上，19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农民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援助。当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上下两议院中那些所谓的‘农业集团’就会很快的采取行动”。而“美国的农业革命，在机器使用方面，是出现于1860年以后的那半个世纪”，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因为减少了摩擦成本也就减少了制度安排的障碍，使得新技术与生产模式得以在新的产权结构上顺利延伸到农业中。而在中国，国家对于农民的福利安排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对于农民来说，一方面，土地是他们惟一生存来源；另一方面，作为垄断利益代表者的宗族制代理人或大地主不会轻易地放弃原有的制度模式或垄断权力。于是来自利益丧失者的阻力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的生产方式在农村或整个农业中得到真正的建立。

从意识形态投资理论的角度来说，法律上的变革正是先来自于习惯上的变革，而严格的宗法和礼仪制度也对新要素的引进带来了巨大的协调成本。我们这里假定宗法制的代理人，通过对道德、伦理的投资改变人们的效用曲线（可能也包括其自身的效用函数），从而改变人们的成本——收益模型，使新的边际收益等于新的边际成本的行为选择能满足意识形态投资者垄断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理性被心理学家们认为是受一种集体所有物限制的意识，也就是一种集体共同的信仰或观念。人是在由这种集体所有物发展成的精神流行病的“无意识”中选择自己的决策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既然如此，那么要改变人们的决策模型只有首先改变人们的收益、成本函数，即改变这种受约束的理性。当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改变达到一定程度后，或者外来的刺激（自然条件的